

# 退出的近代性<sup>\*</sup>

## ——近代以来东北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王大任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棉种的引进和改良使得东北地区大面积的棉花种植成为可能。尽管当地农民有从棉花种植获取更高收益的动力和憧憬,冻害和病虫害因素所带来收益不稳定性一直构成了制约东北植棉业发展的瓶颈。在棉种改良成果无法同时解决冻害和病虫害的情况下,东北棉田的维持和扩张更多的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象征着“近代性”的棉花种植并未使东北农民真正受益,是市场机制下棉花种植从东北退出的最根本原因。

**关键词:**东北 棉花 农业近代化 市场机制

### 一、以往研究及笔者的研究角度

东北本非传统产棉区,棉花却曾经作为一种重要的特产作物在 20 世纪 30—70 年代的东北农业中兴盛一时,改革开放以后又迅速式微。对于东北棉业生产这段“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国内学界仅在少数几本通论东北农业的专著中一笔带过,<sup>①</sup>或在少数几篇学位论文中做过“专项”研究。<sup>②</sup>不过此类研究莫不局限于以一种单线式的近代化史观审视近代东北棉花种植业变迁,即通过宏观叙事的手法,把棉花因良种引进、种子改良试验、生产技术改良等因素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种植面积扩张等同于一个不可逆的农业近代化历程,将其定性为一个高经济效益、经营集约的近代农业技术成果代替传统作物的过程;<sup>③</sup>在史料使用上,部分研究者过于偏信“满铁”系史料关于棉花种植经济效益高的判断,而很少探讨“满铁”系资料背后所隐藏的立场;在研究时段上则“只观其兴不观其亡”。此类研究以 1945 年或 1949 年的时间节点作为其研究的终点,完全忽略了对东北植棉业衰败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更进一步的剖析,不免有“半部历史”的缺憾。

诚然,棉花作物在东北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近代性要素介入东北农村的过程。然而,东北农民对于这种近代性要素的反应却从来不是单向性的。在这一过程中,环境、技术、政治权力等都是农户作物选择中不得不慎重考虑的条件。因此,应从棉花种植在近代东北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及当时政治社会环境出发,聚焦到历史当事人——农民的切身利益进行评价。简而言

[作者简介] 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wangdr@cass.org.c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第四卷)”(项目批准号:10&ZD074);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转型研究”阶段成果。

①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5—497 页;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1—244 页;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9—312 页等。

② 如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吉林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许玥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辽宁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③ 如衣保中认为,棉花在东北南部迅速替代了大豆等传统作物,使当地农业“走上一条经营集约化的道路,即大量栽培经济作物,利用较少的耕地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农民种植(棉花等)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农业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495 页)。

之,本文正是要尝试突破上述单线式的农业近代化史观的限制,通过口述史访谈、农业科学报告等史料,还原棉花种植在东北农村的“兴勃亡忽”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引发我们对农业近代化发展路径选择的深刻反思。

## 二、东北棉花种植的气候限制

东北地区地跨寒温带和暖温带,全境以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在大陆季风影响下,东北地区的气候状况呈现出冬夏温差极大、无霜期短的特征。这种气候特征对当地农作物的影响甚为巨大,“因为结霜之时,农作物之内部组织必致破坏,使其生机停止,故农作物之生长必在无霜期”。而东北“大陆气候特征,乃一届秋初,气温急降。入十月常有早霜袭来”;“春霜末期概终于四月中旬”,<sup>①</sup>足见其无霜期之短。故民国时期学者王成敬感言到:“东北的无霜期即农作物的生育期,只有沈阳以南的半岛部分在150日以上,大部分是在110—150日之间,在中国除了海拔高度四五千公尺的康藏大高原(笔者按:即青藏高原)以外,是再也没有这样短促的农作物生长季节了”。<sup>②</sup>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东北农民的作物品种选择倾向于种植那些作物成后期比较短暂的或耐寒性比较好的作物,如玉米、大豆、高粱、粟等。这些作物绝大部分是粮食作物。而对于以棉花、桑树为代表的在我国其它地区颇为普及的作物,在未发生近代品种改良前,由于生长期和抗寒性等原因,一直不适合在东北地区大量种植。<sup>③</sup>

众所周知,棉花是一种抗寒性极差的作物,“降霜迟早于棉作收获上关系甚大。幼苗若逢晚霜,则棉苗冻死。收获时若逢初霜则阻碍开絮,且丝维品质恶化”;“乃一届秋初,气温急降,入十月常有早霜来袭。棉花正值开絮期中,逢此则生机终了”。<sup>④</sup>因此,能够在东北种植的棉花必须是生长周期至少低于150天的早熟品种。尽管东北棉花种植年代较早,<sup>⑤</sup>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北美大陆棉种大量引进以前,东北地区原有的棉花仅以亚洲特有的赤木种草棉为主。此类棉种主要集中在辽西北和辽南地区有少量种植,辽阳地区多为赤木黑种,锦州地区多为赤木白种。<sup>⑥</sup>1915年奉天省总计种棉316942亩,收获量2789423斤,种植面积仅占奉天省耕地面积的0.5%。<sup>⑦</sup>当时棉花种植较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东北土生棉花亩产量很低,1915年奉天省平均仅为8.8斤。<sup>⑧</sup>而同时期华北地区的土棉平年亩产量为七八十斤。<sup>⑨</sup>此外,质量较差,销路有限,“土种(棉)纤维太短,弹力甚强,多供棉被之用,丝厂所用原料尚须仰给海外”。<sup>⑩</sup>

由于东北地区棉花种植的气候限制,使得该地区在棉种改良前,原有棉种植面积很小,产量很

① “华北棉产改进会调查科”编印:《“满洲”棉产调查报告》,1940年版,第92页。

② 王成敬:《东北之经济资源》,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1947年)版,第16页。

③ 陈桦先生在分析东北经济区的形成时,亦有云:“冬季长,无霜期短,气候异常寒冷的特点,导致了以平原沃野为主体的东北农业生产,基本亦种植那些生长期较短,而较耐寒的旱季作物为主,如玉米、高粱、谷子、小麦、糜子、豆类等。”(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④ “华北棉产改进会调查科”编印:《“满洲”棉产调查报告》,第92、96页。

⑤ 按《盛京通志》卷二十七《物产》中引用《新唐书·渤海传》的说法,《渤海传》中“显州之布,沃洲之绵”的“绵”就是指棉花,因此,东北唐代就有棉花种植。不过,现在大多数学者对此并不认同,认为《辽东志》卷一·地理志“物产”条中的“木棉”才是确定东北种植棉花时间的依据,在诸如《辽宁省志·农业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55页)、日伪华北棉产改进会调查科的《“满洲”棉产调查报告》(1940年,第92页)、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页)等研究中都采信了这种说法。

⑥ 大连商工会議所『“满蒙”事情』,昭和7年,2页。

⑦ “满蒙”文化協會『“满蒙”全書』第3卷,大正12年(1923年),37、290页。

⑧ “满蒙”文化協會『“满蒙”全書』第3卷,大正12年(1923年),290页。

⑨ 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第293页。

⑩ 张其昀:《东北失地之经济概况》,南京中山书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第20页。

低。“当地居民不种棉、不织布，须卖出粮食购买棉布等”，<sup>①</sup>农家经营亦从未出现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男耕女织”模式。

### 三、技术与人地压力带来的转机

早在1911年，奉天纺织厂就设立“原棉供给会”，试图直接将美洲陆地棉直接引入东北农村推广，但是因效果奇差，最后不了了之。而同一时期，日本在着手对东北经济侵略之际，为集聚战备资源，“痛感”在东北种植棉花的“必要”，于是在“满铁”附属的关东局农事试验场、辽阳棉花试验场、公主岭农事试验场、熊岳城农事试验场等农业机构里，收集了世界各地百余种棉种，加紧了改良棉种的试验。1924年以后，相继成立了棉花栽培协会、伪满洲棉花协会、“日满”棉花协会等机构，专门负责陆地棉和改良棉种的推广。<sup>②</sup> 20世纪20年代，“满铁”的农事试验机构在诸多外来棉种中，精选出了“金字”陆地棉和“脱字”陆地棉在东北地区进行试验，其中“脱字”陆地棉因成熟期晚，很快就被淘汰了。而“金字”陆地棉却因产量比本地棉多一倍以上，而在海城、辽西、热河一带被农户大量种植。在棉种改良上，1928年辽阳棉花试验场由朝鲜改良的“木浦一一三号”陆地棉使用集团淘汰法选出了“金字一一三号”改良陆地棉；1930年关东厅农事试验场由朝鲜改良的“金字”棉中通过纯系分离法育成了“关农一号”改良陆地棉，1935年和1938年辽阳棉花试验场又用本地棉种“郑家屯白种”依照纯系分离法分别育成了“辽阳一号”和“辽阳二号”改良土棉。<sup>③</sup> 改良品种均具有早熟和高产的优良特性，在奉天、热河等地被普及并替代原有棉种。至伪满统治末期，种植“辽阳一号”改良土棉地区主要有辽阳、辽中、立山等地，种植面积共计51 435公顷；种植“关农一号”改良陆地棉的地区主要有复县、盖平、海城、庄河、黑山、彰武、北镇、盘山、台安、锦县、锦西、兴城、绥中、义县、朝阳、凌源、平泉、承德、青龙、新民、康平、法库、铁岭等地，共计205 242公顷；而土棉“郑家屯一号”的种植范围则限于康平、法库、铁岭等地，种植面积仅有10 340公顷。改良棉种的播种面积已经占到了全部播种面积的96.1%。<sup>④</sup>

推动棉花在东北农村中种植的另一大动力则是该地日益严重的人地压力。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从1880—1930年短短50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了近3倍，平均年增长率为6%。大量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东北很多旧垦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已经人满为患。1908—1931年期间，东北南部旧垦区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了23%。<sup>⑤</sup> 人口压力的提高，使得当地农民迫切需要种植单位面积收益较高的农作物。根据锦州关东厅农事试验场于1927—1931年间的测试结果，如果单位面积棉花（应为陆地棉）收益指数是100的话，花生是79，粟米是88，高粱是46，玉米是41，大豆则只有18。<sup>⑥</sup> 如果是产量比普通陆地棉高30%以上的“关农一号”改良陆地棉的话，收益很可能还会多得多。<sup>⑦</sup> 尽管这一试验场中的数据与农村实地情况有很大出入，但是在有栽培技术保障的条件下，棉花的平年收成还是可以确定要高于其他作物。<sup>⑧</sup>

另外，棉花是一种需要较多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作物，按东北南部地区传统农法种植棉花，每晌大约要花费195个工作日，所消耗的劳动力时间是大豆（每晌62个工作日）的3.15倍，是高粱（每晌72

① 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页。

② [日]满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内部发行，1987年，第522页。

③ “华北棉产改进会调查科”：《“满洲”棉产调查报告》，1940年，第71—76页。

④ 李鸿业：《东北棉业之发展（一）》，《纺织周刊》，1947年第8卷第8期，第240页。

⑤ 王大臣：《压力下的选择：近代东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⑥ 大連商工会議所「“满洲”の棉花問題」『東亞經濟事情叢刊』第1輯，昭和10年（1935年），23—24页。

⑦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農務課「“满洲”の棉花」，昭和11年（1936年），67—68页。

⑧ 根据1925年“满铁”调查实地的结果，单位面积的棉花仅比大豆种植增收120%左右，比高粱增收150%左右（“满铁”经济调查会「满铁调查月报」第十二卷4号，昭和7年（1932年），234—242页）。

个工作日)的2.7倍,是小麦(每晌39个工作日)的5倍。<sup>①</sup>东北向来以粗放农业为主,只有在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前提下,农家才有可能密集投入种植棉花所需的劳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人地压力日益增大是推动棉花在东北地区种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无棉种良种改良的成果支持,该地农民种植棉花的热情也不太高。1931年改良棉种普及前,奉天省棉花种植面积尽管较前期有较大增长,达38730公顷,但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却也仅有0.8%。<sup>②</sup>

#### 四、伪满棉花统制政策的催动

日寇于1931年占领东北地区以后,“强烈地要求确保‘满洲’作为它的主要工业的纤维工业的原料产地”,从东北掠夺棉花充当军需资源,始终全力争取扩大棉花生产。<sup>③</sup>1933年3月1日,伪满政府颁布了《经济建设纲要》,提出要确立由日本通过“‘日满’经济一体化”垄断控制伪满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统制政策。《纲要》中专门提出了“20年棉花增产计划”的构想,计划“派遣技术指导员”、“棉种面积的扩张”和“栽培方法的改良”,“实现在‘满洲’棉花可能种植地带奖励棉花种植并全力增加生产,确保军需品和纺织原料的充足供应”。力争在20年内,将棉花种植面积扩张7.5倍,达到30万公顷,棉花收获量增加8.5倍,突破15000万斤。<sup>④</sup>并同时推出了“‘满洲’棉花改良十年计划”,向种苗农户发放良种和低息贷款。1933年4月,日伪还组织了“满洲棉花协会”,此机构主要负责对棉花种植户提供奖励和指导。“‘满洲’棉花协会系利用采种圃及协同组合为促进棉花增产之原动力,或领导种棉农户,将棉花共同售卖,或奖励用喷雾器撒布药剂”。<sup>⑤</sup>同年9月,又设立了“棉花收买总处”,专门从事棉花的收购。1934年4月,又将此机构改组为“满洲棉花股份有限公司”,“统制棉花的买卖,资本定为日金二百万元,这就是日本独占东北的棉花,榨取农民的机关”。“东北农民在利诱势逼之下,改种棉花的很多”。<sup>⑥</sup>

1937年以后,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开始在东北农产品领域全面实行统制政策,进一步加紧了东北地区棉花在内的农产品的掠夺。并在伪满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在1941年完成棉花种植面积18万公顷,籽棉产量14.9万吨。1937年11月,伪满颁布《棉花统制法》,随后又颁布《棉花统制法施行规则》,对棉花的产供销及棉种改良、配给实行一元化的经济统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东北棉花的掠夺更疯狂。其随即颁布的《棉花增产法案》规定,1945年棉花产量应至少达到60万担。为了确保这一掠夺计划的实施,伪满的棉花统制机构进一步完善。在推进增产方面,构建了一套由行政机构实行监督策划,由兴农合作社实行实践指导,由棉花会社实际操作的完整统制体系。并对产棉区农民种棉、卖棉实行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所谓利诱,就是给种棉者发放“种棉奖励金”(1941年的标准是每公顷10元),给予种棉户一定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并对种棉户“出荷”棉花配售一定数量的豆油、豆饼、化肥等“统制”的生活生产必需品,“在当时之物资匮乏环境下,此法收效非鲜”。<sup>⑦</sup>所谓威逼,就是对棉产区农户种植棉花的面积和比率实行严格的“统制”,不得随意更改。并对农民生产的棉花实行强制性的“棉花出荷”。所谓“出荷”,就是按一定价格、一定数量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春订秋不变,不管秋后收成如何,强迫农民如数‘出荷’”。到后来还发展到“武装出荷”的程度。<sup>⑧</sup>

① 刘祖荫:《伪满洲农业经济概论》,1944年版,第272页。

② 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调查课《伪满洲产业统计(昭和6年)》,昭和八年(1933年),10—11页。

③ [日]满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

④ 大连商工会議所「“满洲”の棉花問題」『東亜經濟事情叢刊』第1輯,昭和10年(1935年),2—5页。

⑤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印:《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版,第117页。

⑥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26—527页。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印:《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119页。

⑧ 孙邦:《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

在日伪政权的软硬兼施下,再加上良种引进的作用逐渐显现,整个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棉花的种植面积和收获量都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如图1所示,1931年至1945年,东北地区棉花的种植面积从38730公顷扩大到222367公顷。收获量也从1933年的116896千市斤增长到1945年的249324千市斤。<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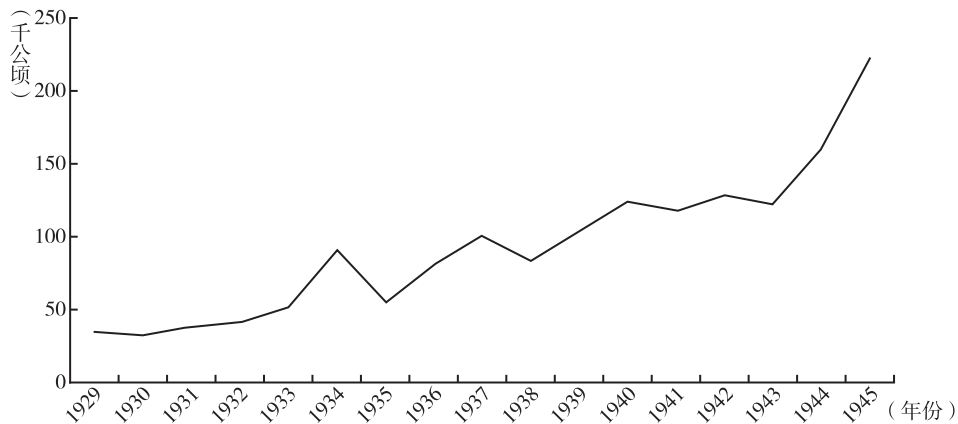


图1 1929年—1945年东北棉花种植面积变化图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農務課『“滿洲”の棉花』,昭和11年(1936年),16页;“日滿”農政研究会新京事務局『“滿洲”農業要覽』,(伪)康德7年(1940年),425—427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120页。

## 五、伪满时期农户棉花种植的无奈及潜在危机

由于统制经济政策的逼诱和良种普及的推进,再结合人口压力下提高耕地收益率的需求,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始终保持快速增长。不过,在东北棉花种植业表面的辉煌下,农民不但并未从中受益反而颇有怨言。

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棉花生产销售实行严格统制,很多农户被强迫种棉和卖棉,积极性极低。根据笔者在东北棉产区的实地口述访谈,“小鬼子叫种棉可霸道了,把村里的土地整个重新量了一遍,叫哪块地种棉花哪块地就得种,少一点也不行”。<sup>②</sup>秋天,无论收成如何,都必须按照指定的价格和数量将棉花“出荷”给日伪组织的“出荷督励班”。私自买卖棉花者将被定罪为“经济犯”。“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户,则施以酷刑。如‘跪板凳、举林桔、打板子、压杠子、灌凉水’等等。至于翻箱倒柜、打骂群众,则是家常便饭”。<sup>③</sup>有的产棉区农民甚至私自购买高价的“黑市”棉花或“把自己棉被里的棉花拿出来交任务”。至于“出荷”的价格更是“低于市价的10%”。“棉农每年卖棉花所得的报酬,尚不能换回足够的食粮。种棉区有饿死人的”。<sup>④</sup>

除了日伪对于棉花的统制掠夺政策外,棉花收益的不稳定也是农民对种植棉花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却常常忽略此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因为在残酷的棉花统制政策下,棉花收益不稳定的问题被忽略。二是因为很多研究者轻信“满铁”系资料中关于棉花收益率的数据,忽略了此类数据多是在“农事试验场”的温室条件下得出,与农村实地情况有很大出入。尽管在正常状态下棉花的收益要远高于其他作物,然而病虫害、旱涝、霜灾等因素

①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120页。

② 采访人:王大任。采访对象:赵长新,1924年生,解放前长期在海城英落乡务农。采访时间:2006年。王大任笔录保存。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版,第48页。

④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2页。

都会造成棉花大幅度减产甚至绝产。棉花的实际收益率远远没有当时很多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那  
么稳定。

棉花收益最不稳定的影响因素莫过于病虫害。解放前,东北地区棉花的病虫害种类就有立枯病、枯萎病、黑斑病、叶卷病(蚜虫)、黄萎病、叶斑病、炭疽病、巴西棉萌病、角点病、冠瘿病等数十种之多。<sup>①</sup>一些有识之士当时就已经认识到“防治虫害是东北植棉成败的关键,棉作病虫害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发生,但在东北特别严重;因为东北棉花生长期很短,如果棉苗遭受了虫害便没有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后完成霜前吐絮”。<sup>②</sup>更严重的是,解放前东北地区引进的生长期短的陆地棉和改良棉种尽管适应了东北较短的无霜期,但普遍抗病力较差,如东北地区种植最普遍的“关农一号”改良美棉就普遍被评价为“苗期抗病力较差”,<sup>③</sup>其黄萎病的发病率高达52.47%,而且“关农一号”的发病时期,有二分之一的病株是在棉花生育盛期——蕾期和花期发病的”。<sup>④</sup>对于蚜虫,各棉种中也是“关农一号,繁殖最烈”。<sup>⑤</sup>另外,东北地区的土质和当时的施肥习惯也很大程度地加重了该地棉花病虫害的蔓延。“东北土质大部为壤土及沙质壤土,以含磷、钾较多”,“惟以病虫害较重,如蚜虫、及尺蠖、红蜘蛛、卷叶虫等”。<sup>⑥</sup>该地“施肥是以土粪为主,用硫酸和过磷酸石灰作追肥的也很多。棉田中常遗留  
下些枯枝落叶,在整枝时,打下的枝叶,也扔在地里。所以棉田清洁方面作得较差。因此病原菌的逐年积累,是病菌扩大蔓延的原因之一”。<sup>⑦</sup>

另外,东北地区早霜冻害和水旱灾对棉花收成的影响也很大。尽管普遍采用早熟棉种,早霜冻害对该地棉花的影响仍然不小,“偶遇天时不佳,即影响收获”。<sup>⑧</sup>“解放前海城的棉花三五年就遇到一次霜灾,霜打到(棉花)桃上,有些(棉花)就会出现死桃。不长或少长棉絮”。<sup>⑨</sup>另外棉花常因“春旱之关系,发芽延迟。若至六月间仍未降雨,则全收获多无望矣”,故“春旱为棉产扩展上之重要问题”。<sup>⑩</sup>如1935年“因气候不良,雨少风多,棉田大减,且每亩产量降低”,1937年“气温骤高骤低,各地旱涝不均,因此废田甚多,农民多改种其他作物,更以缺株关系,立枯病发生极烈,因之产量大减”。1938年,也是“天力难回,挽早无计”。此后东北棉田还“屡遭旱旱”,唯有“因伪满政府督促甚厉”,才始终保持种植面积增长的态势。<sup>⑪</sup>

上述灾害因素使得棉花收获量相对于其他作物更加不稳定。根据表1可见,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离散系数要远远高于其他作物。更严重的是,由于病虫害越来越严重等因素,尽管棉花的种植面积在伪满时期逐步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却在逐步缩小:1933年每公顷棉田产棉2357市斤,1934年是1809市斤,1935年为1349市斤,1936年为1402市斤,1937年为1322市斤,1938年为1039市斤,1939年为1085市斤,1940年为1232市斤,1941年为1196市斤,1942年为1107市斤,1943年为865市斤,1944年为1137市斤,1945年为1121市斤。<sup>⑫</sup>这样就导致农民种植棉花经常会出现收益小于粮食作物甚至亏损的情况,以1934年的情况为例,每公顷高粱的纯收益是55.41元,玉米是每公顷45.58元,粟是每公顷106.82元,当时东北地区39个产棉县中,尽管种棉收益最高的县要达到每公

① 夏起诗:《东北棉业综览(六)》,《纺建》,1948年第2卷第3—4期。

② 林山:《东北棉产问题》,《东北农业》,1949年第2期。

③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编著:《中国棉花栽培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④ 辽宁省农业厅编著:《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1页。

⑤ 夏起诗:《东北棉业综览(八)(附表)》,《纺建》1948年第2卷,第6—7期。

⑥ 李鸿业:《东北棉业之发展(三)(附表)》,《纺织周刊》1947年8卷11期。

⑦ 耿殿桀:《东北棉花黄萎病介绍》,《农业科学通讯》1955年第8期。

⑧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印:《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176页。

⑨ 采访人:王大任。采访对象:赵长新,1924年生,解放前长期在海城英落乡务农。采访时间:2006年。王大任笔录保存。

⑩ “华北棉产改进会调查科”编印:《“满洲”棉产调查报告》,1940年,第95页。

⑪ 夏起诗:《东北棉业综览(二)》,《纺建》,1948年第1卷第6期。

⑫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印:《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120页。

顷 366.2 元,其平均单位面积收益也要高于三种上述作物。但是有 10 个县种棉的单位面积收益亏损,有 16 个县种棉的单位面积收益要低于玉米和高粱,21 个县种棉的单位面积收益要低于粟。<sup>①</sup>

表 1 1933—1945 年间东北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离散系数

作物	棉花	大豆	高粱	玉米	谷子	水稻
离散系数	0.274	0.125	0.076	0.148	0.113	0.125

资料来源: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印:《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第 113—114,120 页。

显然在伪满末期东北南部人地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即便有种植棉花获取更高收益的动力,棉花收益不稳定性也同样对农民种棉积极性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伪满时期植棉面积的扩张“泡沫”不小。当时东北南部的辽宁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成了一个缺粮省,高粱、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开始需要依靠进口来维持。<sup>②</sup> 农民生产的目的日益趋于自给,已经到了“种棉种稻日日勤,衣食缺少无人补”的境地。<sup>③</sup>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农民在承受较大生存压力时,经济行为会自觉遵守“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的原则。<sup>④</sup> 棉花作为一种无法直接获取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收益的不稳定显而易见会对农家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在棉花收益诸多不稳定因素中,各种病虫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棉田的扩大而集聚发展,为 20 世纪 50 年代辽宁棉花黄萎病的大爆发埋下了潜在隐患。

## 六、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棉花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战事的影响以及伪满时期统制政策使农户尚心有余悸,“视植棉为畏途”,东北棉田产量“锐减”,<sup>⑤</sup>很多地方“植棉者几乎绝迹”。1949 年东北全境解放后,中共东北局对棉花生产十分重视。提出了提高棉花“特产价格”,“经过预购,订货,便于掌握生产情况,更有计划的进行生产”,争取 1950 年将棉花产量“增加一倍”。<sup>⑥</sup> 仅辽西一地,1949 年就“及时颁布了奖励植棉条例,贷发了 2 235 637 斤棉子”。<sup>⑦</sup> 1950 年春,“为了把棉花生产和收购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东北棉产区进一步扩大了棉花预购的范围。由合作社和棉农在春季签订预购合同,发放 10%—15% 的定金(也可以折成一定物资)。秋季,农民按照合同价格向国家出售棉花,合作社还会负责给农民提供一定数量来年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棉花预购使棉农从生产到销售及购买物资上,都得到了实惠。通过预购措施,不仅激发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而且使国家进一步掌握了棉花资源”。<sup>⑧</sup> 1951 年和 1952 年,东北棉花生产攀登上了历史顶点。辽宁(东北几乎全部棉花都产自辽宁)棉花种植面积在两年分别达到了 447.8 千公顷和 407.0 千公顷(参见图 2)。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一种十分厉害的棉花病害——棉花黄萎病也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张逐渐蔓延,并于 1951—1955 年期间开始爆发,其中以辽阳、海城、盖县、营口、黑山等几个东北产棉主力县最为严重。<sup>⑨</sup> 东北地区无霜期短的地域特征,以及前些年因为农民积极种棉而普遍存在的棉田连作等问题,也使得这场病害更加凶猛,棉农深受其害。黄萎病在当时最高可以“使棉花减产 70%—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农务课『“满洲”の棉花』,昭和 11 年(1936 年),第 16—18 页。

② 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农林处编印:《民国三十三年度东北农产品生产消费统计》,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版,第 11 页。

③ 铃木甫『“满洲”农村民謡集』“满洲”事情案内所,(伪)康德 7 年(1940 年),32—33 页。

④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 页。

⑤ 李鸿业:《东北棉业之发展(一)》,《纺织周刊》1947 年第 8 卷第 8 期。

⑥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著:《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04—605 页。

⑦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著:《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88 页。

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编:《中国棉花产需平衡研究》,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5 页。

⑨ 何庸等:《东北棉花黄萎病调查报告》,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室编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汇编(1949—1978)》,1979 年版,第 138 页。此病在伪满时期就发生过,但是因当时东北棉田刚刚开始扩张,传播范围和危害都尚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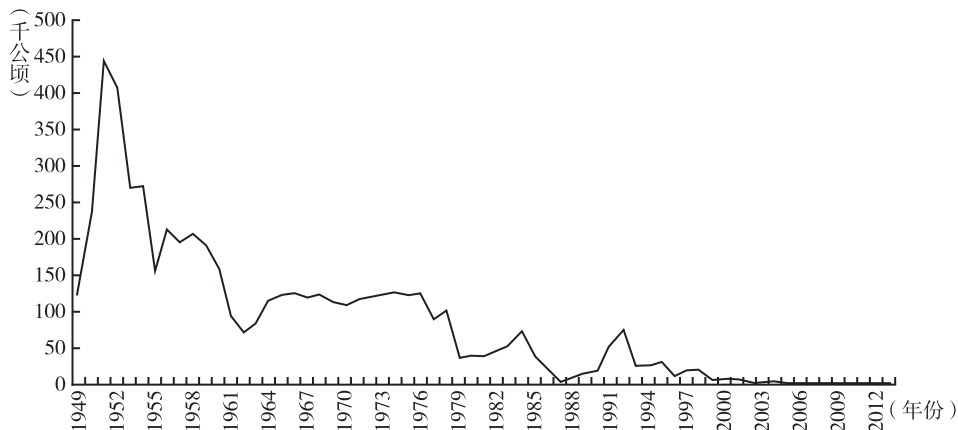


图2 1949—2013年辽宁棉花种植面积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辽宁统计年鉴》及辽宁统计局编:《辉煌的岁月——辽宁60年回眸1949—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80%”,而且“在土中生活多年”,病势也“一年凶过一年”,成为“一种毁灭性的病害”。<sup>①</sup>“老乡们已感到它的严重性。的确是有谈虎色变之感。依当前情况看来,新病区是逐年增加,旧病区是逐年加重,对棉花生产造成很大的威胁”<sup>②</sup>。随后,棉花枯萎病又从盖平地区开始蔓延,“这两种病害(黄萎病和枯萎病)常引起棉株大量死亡,以致一些重病区不得不缩减了棉花的栽培面积”。另外,1955年一些地区棉花茎枯病也忽然爆发,“使若干地区的棉田毁种”。<sup>③</sup>1953年,红铃虫害也在朝阳棉田爆发,“僵瓢烂铃多的达50%以上”。<sup>④</sup>病虫害的频繁发作严重挫伤了农民种棉的积极性,棉花种植面积迅速缩小,1955年辽宁棉田下降到了155.6千公顷(参见图2),仅为1951年的34.7%。<sup>⑤</sup>

在病害肆虐的严峻形势下,东北的农业科研工作者针对该地实地特征,20世纪50—70年代培育出了很多优良的早熟抗病棉种。其中包括我国最早的抗黄萎病品种辽棉1号、辽棉2号,大铃早熟棉黑山棉1号,我国最早的抗枯萎病早熟棉辽棉3号、我国第一种抗黄萎病育种棉辽棉5号等等。<sup>⑥</sup>在此期间,辽宁棉花前后共经过了四次大规模换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棉花病虫害的肆虐蔓延。<sup>⑦</sup>

不过,这些棉种改良的成果至少在当时并未起到重振东北棉花种植业的作用。首先,所培育的早熟抗病棉种,单产很低。20世纪70年代后期辽宁棉花亩产水平和20世纪50年代初相差不多,1978年辽宁棉花平均亩产仅15.59公斤。<sup>⑧</sup>其次,东北地区棉种改良的重点工作还是放在抗病性上,

① 河南省农林厅教材编辑委员会编著:《作物病虫害防治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

② 耿殿荣:《东北棉花黄萎病介绍》,《农业科学通讯》1955年第8期。

③ 中国农业科学院东北农业研究所编著:《东北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手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779页。

⑤ 1955年以后东北棉花受灾减产,政府对这种情况十分重视,指出“应扭转棉田逐年缩减的趋势,积极加以恢复”,强调“任务是艰巨的,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完成,而且力争超过”。除将“植棉任务”逐级布置下去,“在干部中群众中做好扩大棉田的思想动员”外,还“广泛开展种棉技术的传授工作”,在肥料、农药等方面为棉花增产提供保障,并为“因受灾而缺种的棉区”供应了大量棉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786—791页),并大幅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准许以棉花代缴农业税。通过这些措施,1956—1959年间东北棉花的种植面积出现了一次不小的反弹。在此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棉农口粮不足,矛盾非常突出”,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少种多报、借灾毁种、棉田间种粮菜的现象”。因此1960—1962年间“棉田面积和产量都大幅度下降”。1963年以后,辽宁地区在省政府“粮棉并举”、“保证面积”的要求下,棉花种植面积有小幅度回升,但是却始终未能恢复到1950年代的程度(参见辽宁省农业局编印《辽宁农业历史资料(1949—1980)》,1982年版,第41—43页)。

⑥ 孙长君:《辽宁棉花育种发展历程及主攻目标探讨》,《安徽农学通报》2008年第11期。

⑦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辽宁省志农业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⑧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辽宁省志农业志》,第154—155页。



其品种的早熟性仅是相对于正常生长期而言,遇有早晚霜冻害仍然损失惨重,且其改良棉种的生长期“从整体上看,棉花品种有逐渐偏晚的趋势而且越选越晚”。东北地区早晚霜冻害十分频繁,“平均每四年一次”。导致棉农“严重时仅能收到剥桃花”。<sup>①</sup> 冻害对东北地区棉花生产的危害极大,在冻害较为严重的1976年,辽宁省“棉花单产只有12斤,霜前花率最高只有20%,大部分地区根本未收到霜前花”。<sup>②</sup> 最后,这些改良的棉花抗病早熟品种只能一定程度上延缓棉花病虫害,病虫害威胁仍然不可忽视。如辽宁盖平县在20世纪70年代换种后,棉花黄萎病仍然“连年发生”,棉花产量“低而不稳”,“棉农口粮不足,部分棉花田改种粮食、商品菜”。<sup>③</sup>

尽管棉花产量始终“低而不稳”,东北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却始终保持在10万公顷以上。这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决定的:国家为了确保棉花供给,始终在东北棉花的生产中实行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制度,硬性规定棉花的种植面积计划,再自上而下地从省贯彻到生产队。<sup>④</sup> 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仅对辽宁省的棉花收购任务就平均每年在65.5万担左右。<sup>⑤</sup> 农民种植棉花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政策指令强制性。此外,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后,棉花收购价格很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合理。“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棉花单产下降,粮棉之间的收益差距加大,棉粮比价下降到1:13.9,同时又把统一安排棉农口粮的办法改为粮棉统算,使棉农口粮标准更低”,很多棉农得不到足够的口粮,种棉的积极性很低。<sup>⑥</sup> 这就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户种棉时“消极敷衍”,诸如“少种多报”,“撒种不管,放弃管理”,“故意在棉间种植良豆蔬菜”,“借口自然灾害销毁棉种”等。<sup>⑦</sup>

## 七、改革开放后棉花种植在东北地区的退出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棉花的生产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农民在种植棉花问题上有了自主权,很多农民开始根据实地情况选择退棉种粮。另外,当时重新合理规划我国棉花种植区域布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中很多直言应“逐步收缩”如东北这样“不宜棉区”。<sup>⑧</sup> 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以后辽宁省政府开始对省内棉花种植面积进行重新调整,削减了很多产棉地区的植棉任务,1980年将省内种棉县从23个削减到15个。<sup>⑨</sup> 吉林则基本放弃了棉花种植。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取消了棉花统购,并进一步缓和了对棉农生产行为的行政计划控制。1979—1989年间,辽宁棉花种植面积连年降低。从1978年的101.5千公顷降低到1989年的16.2千公顷。

20世纪90年代,因为此一阶段棉花供给紧张,国家曾一度加大了对棉花生产的行政干预,甚至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棉花生产“省长负责制”。“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对棉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层层加码,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不顾当地自然条件和农民经济利益,强迫农民种棉的现象”。<sup>⑩</sup> 由于辽宁很多地区又开始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指令下达农民的种棉任务,辽宁棉花种植面积在90年代初期

① 李心宽:《对影响辽宁棉花产量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探讨》,《中国棉花》1993年第6期。另据徐培秀的研究,“辽宁棉区主要是生长期较短,一般大于15摄氏度的持续日数不足150天,春天气温较低。棉花死苗、缺苗、晚苗严重,而且高温期不长,特别是秋天温度下降迅速,棉花生长后期气温偏低,对纤维成熟不利,霜后花较多,一般年份达30%左右,棉花产量不高,还费劲很大,多年平均亩产多在90斤以下”(徐培秀:《我国棉花生产合理布局的探讨》,《棉花》1979年第6期)。

② 赵月珍:《辽宁棉花的农业气候条件分析及冻害分区》,辽宁省气象局编印:《农业气象论文集(一)》,1980年版,第21页。

③ 曲强:《盖州市志(第1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63页。

④ 朱启荣:《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⑤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棉麻局编:《中国棉花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0(一)》,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249页。

⑥ 辽宁省农业局编印:《辽宁农业历史资料(1949—1980)》,1982年版,第44页。

⑦ 采访人:王大成。采访对象:鞍山市农委。访谈时间:2015年4月。王大成笔录保存。

⑧ 徐培秀:《我国棉花生产合理布局的探讨》,《棉花》1979年第6期。

⑨ 辽宁省农业局编印:《辽宁农业历史资料(1949—1980)》,第45页。

⑩ 朱启荣:《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第113页。

一度出现了不小的反弹。1992年曾经一度回升至74.9千公顷。

不过,此一时期农民在行政指令下种植棉花的热情依旧不高。“不得不种”棉花的农户中,少种多报,故意少投入人力物力,以次等地贫瘠地种棉的情况屡见不鲜。<sup>①</sup>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病虫害和冻害双重压力下所造成的棉农收入不稳定。这一时期,东北种子改良工作仍然推出了诸多成果,并通过1983以来的数次换种显著提高了东北棉花的亩产量,1984年辽宁棉花的亩产量就曾经一度突破了60公斤。<sup>②</sup>不过,这些棉种仍旧在早熟性和抗病性之间存在选择矛盾。在这一时期辽宁培育的棉花品种中,除了“辽棉9号”以外,生长期越来越长,抗冻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而生长期较短的“辽棉9号”却抗黄萎病的能力明显偏弱。很多早熟抗病棉种,也植株较大,不适宜密植,产量颇受影响。况且棉花的抗病品种也仅能对棉花病虫害起到缓解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辽宁)棉区枯黄萎病的发展呈逐步蔓延的趋势”,甚至已经发展到“常规品种的种植已无法解决枯黄萎病的危害,病害的问题已是危及(辽宁)棉区生存的关键问题”。<sup>③</sup>1992年原来危害不明显的棉铃虫也在辽宁棉区大规模爆发,针对黄萎病的抗病品种根本不起作用,很多棉田绝收,农民亦深受其害。<sup>④</sup>即便是抗黄萎病较好的棉种,“每年仍要打药十几次以上”,才能抑制黄萎病蔓延,农民的人力投入和生产成本很大,收益颇受影响,种棉热情不高。<sup>⑤</sup>

199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彻底放开棉花收购价格,实现了棉花流通的市场化。此后,棉花生产领域的行政指令也逐渐被市场机制的调节所代替。此时,辽宁不仅种植棉花的各项成本收益要远低于国内主要产棉区(表2),在劳动时间纯收益上甚至还要小于本省内的粮食作物(辽宁棉花每劳动日纯收益为16.28元,玉米为31.25元,高粱为20.96元)。<sup>⑥</sup>特别是步入21世纪后,随着东北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当地农民对于棉花这种颇耗费劳动力且收益难有保障的作物种植兴趣更低。显而易见,棉花迟早会在市场机制下退出该地农家经营。1998年以后,辽宁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日益缩减,至2013年,辽宁棉田仅余531公顷(见图2)。<sup>⑦</sup>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棉花生产布局做出了巨大调整,由“普遍种植向生产条件优越的地区集中”,而“引导这一发展的动力”是,“单位面积上各种作物的产出效益比”。<sup>⑧</sup>就这一点而言,东北棉花种植面积的缩减是顺应了市场机制介入后全国棉业区域结构调整的大趋势。然而结合东北地区的实地情况来看,该地棉产种植中病虫、冻害等地域性因素所起的作用显然更加突出,农民退出棉花种植的动机也远比全国其他地区强烈。另外,东北棉业中“良种改良”等近代技术手段的作用亦远比国内其他地区显著,东北棉业种植的近代性特性更加突出。尽管目前棉花种植在东北地区已经基本退出,然而该地区棉种改良的很多成果,却在引进以新疆为代表的我国其他北部棉产区后大放异彩。这些棉区无霜期远较东北地区为长(如新疆棉区普遍在180天以上),东北所培养的早熟

① 根据王大任对鞍山市农委的采访。马德功:《辽宁棉花生产滑坡的原因及对策》(《辽宁农业科学》1998年第4期)一文亦有此类情况的叙述。

②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辽宁省志农业志》,第155、160页。

③ 吕春修:《田履亦农辽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④ 焦敏:《三代棉铃虫特大发生年虫量及危害情况的调查报告》,辽宁省昆虫学会编:《东北三省首届昆虫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9页。

⑤ 根据王大任对鞍山市农委的采访。

⑥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2》,第140、158、204页。

⑦ 1978年至2009年间,辽宁除棉花种植面积显著下降外,粮食作物和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比率都呈现出缓慢下跌的态势,蔬菜的种植面积同期大幅度上升。在粮食作物中,水稻逐渐替代玉米、高粱等传统粮食作物,农产品商品化率亦逐年提高(参见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编《辽宁统计调查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366—369页)。这标志着农民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作物种植比率“朝着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进行了更加合理的调整(参见辽宁省农业区划研究所,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国土处:《辽宁省农业发展规划研究》,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农业区划研究所编:《中国棉花产需平衡研究》,第26页。

抗病棉种正好在此类地区大展宏图。这也许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棉花种植努力所留给后人的最宝贵成果。

表 2 2001 年全国主要棉产区的成本收益指标

	每亩成本纯收益率(%)	每亩纯收益(元)	每劳动日纯收益(元)
辽宁	33.49	162.09	16.28
河北	57.80	247.52	20.98
河南	60.55	242.18	17.54
山东	42.28	231.87	19.07
甘肃	92.32	541.10	36.64
新疆	30.20	214.13	21.96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02》,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4—206 页。

## 八、结论

近代以来,棉花作物在东北地区的种植历史可以说十分复杂,并非是以往史学界所认为的单线式近代化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环境因素与科技手段的较量,也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更有农民面对未知近代化因素的憧憬与无奈。聚焦到当地农户切身的经济利益来评价棉花介入和退出东北农业的过程,至少可以引起三个方面的反思:其一,是对日伪政权在东北农村实行掠夺性近代化的反思。剖开“满铁”系资料中种棉高收益的谎言,不难窥见尖锐民族矛盾下日伪政权借助近代化手段对东北农村的控制与掠夺。其二,是对近代性介入传统地域时适应性问题的反思。依照传统观念,代表着科学技术的近代性总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回顾东北棉花品种改良的种种尝试可以发现,象征着近代科学的棉种改良成果在与当地病虫、冻害等地域性因素的较量中从未占据上风。其三,则是对政府行政指令与地方实践间关系的反思。东北农户的棉花种植,诚然包含着他们对于获取更高收益的渴望,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被迫地融入行政指令所设计的近代化“改造”之中。这种强迫性的行政指令既损耗着他们的经济收益,又磨灭着他们的生产热情。如何构建一条适合地域实践的、农民自主参与的农业近代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机制,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值得重视。

### The Exited Modernit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otton Cultiv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s

Wang Daren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tton seed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cultivate cotton in a large scale in Northeast China. Although the local farmers had the impetus and expectation to obtain more benefits from cotton cultivation, the instability of its benefits caused by freeze injury, diseases and pests has always been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cultiv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Seeing that the improved cotton seed failed to settle freeze injury, diseases and pests, the maintenance and expansion of the cotton cultiv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s due largely to the intervention of political power. Cotton cultivation is a symbol of “modernity”, however, the farmers of Northeast China did not benefit from it, which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ause why cotton cultivation eventually exited from Northeast China under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Northtast; Cotton;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Market Mechanism

(责任编辑:王小嘉)